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俄 军 杨富学 主编

西北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保存并出土了大量的秦汉简牍，成为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和内閣档案并列的 20 世纪初发现的四大新史料之一，构成了西北文化的一大特色。在纸张尚未发明以前和纸张虽已发明但尚未广泛使用的时代，简牍作为社会生活中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记录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情况。由于它是当时社会情况的实录，特别是甘肃出土的边塞屯戍文书，是对当时边塞吏卒工作、生活的直观记录，其真实性极高。

张俊民 著

简牍学论稿

——聚沙篇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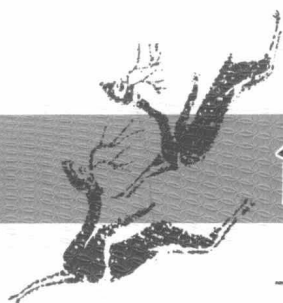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俄 军 杨富学 主编

张俊民 著

简牍学论稿

——聚沙篇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简牍学论稿：聚沙篇 / 张俊民著. --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4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ISBN 978-7-5423-2964-6

I. ①简… II. ①张… III. ①简(考古)—研究
IV. ①K87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2583号

出版人：吉西平

项目负责：白鑫

责任编辑：杨昀

封面设计：徐晋林

简牍学论稿——聚沙篇

张俊民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31.5 插页 4 字数 516千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5423-2964-6 定价：78.00元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西部这片热土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如今随着考古发掘及文献释读的深入，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出版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的图书数以千计，并且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论著问世。“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就是在以往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界关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与总结。

总 序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之路。这条古老的商路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却是中华民族得以向全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国文化得以与西方文化实现交流,成为相互影响、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合璧之路。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互相交往的产物,是东西文明相互撞击的结果,这才是丝绸之路的真正文化价值所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接触与交流,并在以后的交往进程中共同进步。季羨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和吐鲁番是这四大文化体系在全世界仅有的两个交汇点。从人类发展的愿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吐鲁番。”

敦煌、吐鲁番作为四大文明汇聚之地的代表,毋庸置疑。除此之外,长安、于阗、龟兹、楼兰、张掖、武威、天水、西宁、固原等

地也都莫不以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而著称于世。穿越西北的丝绸之路不仅是重要商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甘肃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上唯一不变的交通干道,也是丝绸之路历史遗存最典型、最丰富的地区。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河陇地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之地,更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的枢纽。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吐鲁番文书与石窟、居延汉简与悬泉汉简、黑水城文献、藏文文献等大量古代的文化遗存的相继发现都令世界震撼。丝路文化也逐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最为耀眼的部分,以致对其研究成为东方学诸多学科领域内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甘肃这块贫瘠的土地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汇的要道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必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如今随着考古及文献的不断发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耕耘下,获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截止目前,有关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方面出版的图书数以千计,而且研究范围正日益扩大,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学术成果涌现。

甘肃学术资源丰富,然而就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而言,无疑应首推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三者可并称为拉动甘肃学术研究走向世界的“三驾马车”。甘肃教育出版社

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立足本地,传承文化,追求特色,出版精品”的原则和方针,先后推出了大量优秀的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推重。这套“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的策划与出版,正是该社突出“敦煌文化”与“丝路研究”主导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选题又都和丝路沿线纷繁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息息相关。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是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其中的各分册图书,在该学术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当然,这12册图书只是国内敦煌与丝路文化的部分成果,我们今后还将进一步通过出版续编的方式逐步完善,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正。

文丛的作者,既有成就卓著的老专家,也有青年才俊,更多的则是在这一领域有着突出成就的中年学术骨干。本丛书从策划到编辑,得到了诸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从完善书稿到认真校对,都付出了不少辛劳,从而保证了书稿的写作质量和出版质量,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此外,不少年轻人,如甘肃省博物馆的赵天英,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彭晓静、王东、张海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志鹏以及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俄玉楠、史淑琴、阿尔斯兰、史亚军等都参与了本丛书的具体工作,孜孜矻矻,乐此不疲,保证了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这里致以深深的谢意。

俄军 杨富学

2014年元旦

凡例与说明

一、书中收录的简牍释文基本遵循现有文书格式。其中：

□,表示简牍上一个字不可释;

▣,表示简牍残断;

……,表示有多字不可释;

⊠,表示简牍上此处有花头;

▢,表示简牍上此处有封泥印匣槽;

■,表示简牍上此处有黑方框;

○,表示简牍上此处有穿孔。

二、书中出现的简号分别是：

敦·2325,《敦煌汉简释文》简号,释文以 1991 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版本为准。

10·28,《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号,释文以 1987 年文物出版社的版本为准。

E.P.T58:30,《居延新简》简号,释文以 1990 年文物出版社版本为准。

张简·504,《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以 2001 年文物出版社的版本为准。

I 90DXT0114②:15AB,悬泉汉简简号。“I”代表分区号,“90”代表发掘年度,“DX”代表敦煌悬泉置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T0114”代表探方号,“②”代表探方内层位,“15”代表层位内简牍流水编号,“A”“B”代表简牍正、背面文字。此外,悬泉汉简中还有“H”,代表出土单位是灰坑;“F”,代表出土单位是房址;“F13C”,表示是房屋 13 内的厕所。本书省略探方 T 前面的发掘年度与“DX”。简文作“县泉”,行文作悬泉。

73.E.J.T13:234,金关汉简编号。

睡虎地秦简与其他简牍释文随文标注。

三、文献部分随文注出,以书后参考文献版本为准。

目 录

甘肃简牍概述	(1)
“部”与“候长”论略	(18)
《居延新简》释文例补	(28)
《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浅析	(44)
汉代西北地区屯田的区域性	(51)
简牍文书格式初探	(63)
从汉简谈汉代西北边郡运输的几个问题	(83)
汉代居延屯田小考	(96)
汉简中有关物价问题的几点思考	(106)
《居延新简》中的“聚”	(118)
汉简琐记	(122)
简牍文书与甘肃汉代史地	(134)
《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	(148)
“悬索”与“悬索关”	(160)
敦煌悬泉置探方 T0309 出土简牍概述	(167)
湖北江陵高台 18 号墓木牍释文浅析	(185)
《二年律令·行书律》浅析	(190)
居延汉简纪年考	(200)
秦代的讨债方式	(237)
里耶秦简二题	(245)
《二年律令》与甘肃汉简	(254)

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	(266)
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研究缘起	(278)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木牍考	(285)
简牍文书所见汉代边塞防御系统	(294)
汉代边境防御制度初探	(307)
悬泉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一)	(329)
悬泉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	(344)
悬泉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三)	(362)
悬泉汉简所见人名综述(四)	(379)
简牍文书所见汉代“长安”资料辑考	(414)
悬泉汉简“置丞”简与汉代邮传管理制度的演变	(440)
对汉代悬泉置马匹数量与来源的检讨	(457)
悬泉汉简传马病死爰书及其他	(474)
参考文献	(488)
后记	(495)

甘肃简牍概述

20 世纪是西北地区考古大发现的时期,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明的重要遗迹、遗物大量出土,为我们认识、研究西北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与西北历史关系重大的秦汉简牍,尤其是甘肃汉简。

一、简牍的出土和出版

西北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保存并出土了大量的秦汉简牍,成为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和内阁档案并列的 20 世纪初发现的四大新史料之一,构成了西北文化的一大特色。在纸张尚未发明以前和纸张虽已发明但尚未广泛使用的时代,简牍作为社会生活中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记录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以之为研究对象的简牍学,旨在揭示简牍资料所反映的信息。由于它是当时社会情况的实录,特别是甘肃出土的边塞屯戍文书,是对当时边塞士卒工作、生活的直观记录,其真实性极高。甘肃之所以有“简牍之乡”的美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里出土的汉简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的影响。

1907 年,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探险活动中成功地穿越罗布泊,由新疆进入甘肃的最西端,在疏勒河下游发现了汉塞遗迹,并在汉塞沿线掘得简牍 709 枚。这就是最早发现的“敦煌汉简”。对这批汉简进行开拓性研究的是当时流亡日本的中国学者王国维和罗振玉。1914 年,他们完成了第一部研究简牍的专著《流沙坠简》,从而为国人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学术殿堂。此后,伴随着对西北历史、地理实地调查的展开,又先后发现了几批简牍。

1930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原属甘肃,今属内蒙古的额济纳河流域(古代的居延)发现了汉简,并进行了重点发掘,共获简牍万余枚,这就是常说的“居延汉简”。对该批简牍贡献最大的学者应首推劳榦。1943 年,他在四川南溪以反体照片出版了石印本《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4 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4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

印《居延汉简·释文之部》，图版则于1957年由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次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居延汉简甲编》。198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其编辑的《居延汉简甲乙编》。1987年，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红外线校读再版《居延汉简补编》。2001年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初编，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居延汉简补编》的基础上，又有少量增补，并使用了标点。抗日战争中为避战火，原简于1941年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运返台北，现藏台北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9年后，武威《仪礼》简（600枚）、王杖十简和医药简（92枚）相继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之极其重视，派人主持和领导了整理工作，出版了《武威汉简》^①和《武威汉代医简》^②。

1973至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对当时尚属甘肃的额济纳河流域的破城子、甲渠第四隧和金关等遗址实施科学的考古发掘，掘获汉简两万枚（基本完整的册书七十余部），是为“居延新简”。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居延新简》主要收录了破城子出土的汉简释文。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释文、图版并存的精装本《居延新简》。2001年收入《中国简牍集成》时除标点外，又对释文进行了部分修正。

1979年，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汉简1217枚。在对这批简牍进行整理时，又对当时公布的敦煌境内出土的简牍做了一番整理。在全面收录敦煌出土简牍的基础上，199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初骧、李永良、马建华三人合编的《敦煌汉简释文》。这里面包括的简牍有：1907年斯坦因所获的709枚，曾收入《流沙坠简》者；1913—1915年所获的189枚，曾收入张凤的《汉晋西垂木简汇编》者；1920年，周炳南在小方盘所获的17枚；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等在小方盘所获的49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敦煌博物馆历次采获的简牍。1991年，中华书局再版的《敦煌汉简》，除了敦煌汉简的释文之外还有图版。

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合编的《汉简研究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公布了甘肃省一些地方零星发现的汉简：计有1971年甘谷出土的东汉简23枚，1977年玉门花海出土的汉简91枚，1981年敦煌酥油土出土的汉简76枚，1981年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

①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

②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26枚等。

1986年,天水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共计有简牍460枚及7块木版地图。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发掘,共获简牍两万余枚。悬泉汉简是汉代中西交通线上官方驿站使用过的文书档案,它的出土将为今后研究汉代中西交通、邮驿制度、民族关系提供丰富的资料。该批汉简现正在整理中,有意者参阅《文物》2000年第5期上发表的《悬泉汉简释文选》和《敦煌悬泉汉简概述》。

上述“居延新简”、悬泉汉简和马圈湾汉简、放马滩秦简,现均保存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河西一些县市亦有零星汉简出土或采集。伴随着各地工农业建设的开展,新的简牍还将陆续出土,为甘肃简牍增添新的资料,补充新的营养。

二、简牍的一般情况

简牍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对古人写有文字的竹片和木片的合称。古人称竹质者为简,木质者为牍。不过我们发现,古人所谓“书之竹帛”是侧重于竹简的看法似有不妥,因为,就已有情况来看,各地书写用品是以当地所产材料为依据。在北方的许多地区,竹材甚少,更多的是木材。所以今天的简牍学,已经不再以质材为依据作分类法,而是对竹、木和其他同时并存质材的总称。如汉简之中就有个别是帛书,而悬泉汉简中以其价值甚高而名之为“墙皮题记”者,仍包括在“悬泉汉简”中。下面就介绍一些简牍的一般情况。

(一)简牍的形制

简牍的形制,依其功能、性质、书写格式和大小长短,常见的约有以下几种:

札 《说文》木部:“札,牒也。”片部:“牒,札也。”《汉书·司马相如传》记曰:“上令尚书给笔札。”颜师古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札”作为简牍的形制,是最常见的一种。一般长在汉代1尺左右(约合今23厘米),宽度在0.6~1.2厘米之间。以其宽度和长度,其上仅能容下一行的普通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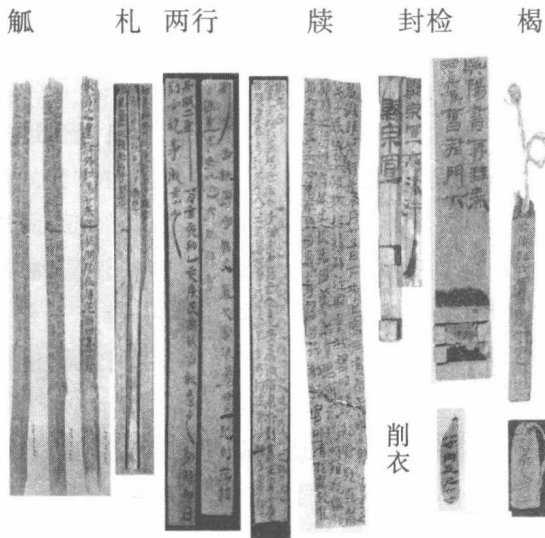


图1 简牍形制图

名之为“札”。取汉简简文中所记之名,许多学者称之为“简”。合数“札”可为“簿”,可为“籍”;若在“簿”“籍”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所记转移公文用语的简,则为汉代官府之间往来的公文书。古代典籍就是由“札”编连而成的。

两行 这一名称亦出于汉简所记,一般文献中极少见。

以其字面之义,则为能容纳两行普通文字的简。长度一般同于“札”,唯宽度较“札”增加一倍左右。常见者简上多书“转移公文用语”和符、传类文书。

牍 《说文》片部:“牍,书版也。”长度与前两种相当,宽度要大于“两行”,书写的文字多在三行以上。多用于书信、器物疏、名刺和遣策等。

封检 《说文》木部:“检,书署也。”封检的样式甚多,有长方形者,有方形者,有梯形者。视其用途各不相同,大小尺寸也不一致,多用于文书或物品传递中的封函。通俗来讲,功能类似于今天的信封、封条。其上有封印泥槽,以绳捆物后施封泥,再于封泥上加盖印章。常见的一种颇类似于今天信封的功能,上署收文单位,表明该文书要传送到什么地方去。如“甲渠候官以邮行”,是发往甲渠候官的书信。另一种则用于封存物品,如囊囊、筐篋等。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一件封检,竟然是挂在驴脖子上的,上有“天依驴一匹,骝牡齿六岁”等字样(敦·1124)。

觚 《说文》作“乡饮酒之爵也”,“从角,瓜声”,以之为酒器,与简牍中之“觚”义不符。《史记·酷吏列传》记“汉兴,破觚为圜”,应劭注“觚八棱,有隅者”,是觚有棱角。《说文》木部:“栝,棱也。从木瓜声。”或觚、栝二字声同而通。汉蒙童字书《急就篇》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中之“觚”,即为写有

文字的木质多面(棱)体。一般简的形状为长方体,有两面,而觚则为多面体,或三棱三面,乃至七、八棱七、八面者。长度视需要可长可短。如悬泉汉简之中的三棱觚,长多在尺许;而居延“候史广德行罚”檄,则有 88.2 厘米长!觚一般多记一事,用于檄书类等较紧急的文书,一端或两处有施封泥的封泥匣。

揭 “揭”,或称之为“签”,即标签,多用于器物、文书的标志。形制短小,多有网格纹头,有穿孔,或系于物,或标于物旁。如“建武三年候粟君责寇恩”册书之第 36 简,长度是 0.9 厘米。

削衣 “削衣”(或称为“柿”“栳”),是现今给予的非常形象的名称。简牍之上书写了错别字,多以书刀削去误写之字而再补写,这削下来的部分就是削衣。这是古代常见的一种书写补正方式(也有将原字抹淡,在旧字之上加改的情况)。削衣的大小和长度是极不规则的,字多者长,字少者则短。广而言之,从简牍上削下来的有字薄木片都可以叫“削衣”。

(二)简牍的长度

文献上有关简牍长度的记述是非常不一致的。《汉书·杜周传》记:“三尺法。”孟康注:“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论衡·谢短篇》记:“二尺四寸,圣人文语。”《仪礼·聘礼》贾疏引郑玄《论语序》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盐铁论·贵圣篇》亦云:“二尺四寸律。”《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策书”曰:“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后汉书·李云传》又有“尺一之板谓诏策”者。文献中的这类记载,在出土的简牍实物中也得到了印证。如武威《仪礼》简中的《士相见》简,长 35.5 厘米;乙本《服传》,长 50.5 厘米;武威医药简长 23~23.4 厘米;放马滩秦简《日书》,长 27.5 厘米;武威“王杖诏书令”简,长 23.2~23.7 厘米;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简,长 16.2 厘米,而《儒家者言》简,则长度仅有 11.5 厘米。我们列举这些数字,旨在说明简牍的长短有很大差别,这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但是汉塞出土的简牍文书却有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长度。汉塞文书多以尺牍的形式出现,即在 23.1 厘米左右。汉代的尺,有大尺和小尺之别,大尺一尺相当于小尺一尺二寸,即 27.7 厘米左右。因此,简牍的长度在这两个数字之间者,均可看做尺牍。

(三)简牍编册之制

合数简为“册”、为“篇”、为“书”,这些是将“简”用丝、革或麻绳之类的

物品编缀在一起。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即编绳数断之意。关于简牍的编册情况,目前所见尚不统一。如武威汉简就有五、四、三、二道编绳的情况,文献中亦有“五道编纶”的记载,“竹简丙本如此。二尺四寸简,第一、第五道编绳距简端、简末很近,第三道居中,第一、二道之间的距离略等于第四、五道之间的距离,而短于第二、三道或第三、四道之间的距离,后两者又是大略相等的”。^①

在居延汉简中,尺牍编连的方法多是以两道书绳的形式出现,以两道书绳将简体分成三等分。为防编绳滑动,或在简体上刻有小楔口。编绳或早于书写,即先编后书;或晚于书写,即先书后编。先编后书者,因编绳妨碍书写,简体上施绳处多显空格;先书后编者,则简体上文字多连续,无明显空格。先书后编者,为防错乱,在每条简的背面注有编号。如“王杖诏书令”册,每简之背面均有编号。由编号可知,“王杖诏书令”册原来至少应该有 27 枚,而今仅存 26 枚。居延汉简之中明确记载有编绳规定的是 E.P. T4:58 简,简文记:“札长尺二寸,当三编□。”按照这条简文的记载,长度在一尺二寸的简则需要用编绳三道进行编联。

(四)简册的收卷

合一定数量的简为一册、一篇、一书。为方便保存,则必须收卷,收卷起来即为“卷”。关于文书的收卷方式,文献记载甚少。究竟是从左向右卷收,还是从右向左卷收呢?根据读书方式,应该是从头部向尾看,所以其卷收的方法,应该是从尾到头,即以尾简为轴,首简在收卷后的最外端,字体向内。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篇目在第一简(或首简)背面的原因。这种方法多用于出土的典籍文献类简牍。而众多的实用文档则又采用另一种方法。后一种方法在甘肃汉简中的反映比较明显。

甘肃简牍虽然大多数属于散简,但是保存下来的有编绳的册书,为考察汉代文书的编册方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如“永元器物簿”“劳边册”和悬泉汉简中的一些册书,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数简成册的编绳方式是从右向左,即从头部向尾用绳,绳头在册书的尾部。为了收卷方便,绳头余下的部分作束卷用。这样,从编绳的方式和绳头结余的方向就可以看出,汉代普通公文书简册的收卷方向是由右向左收,册书的开头在最里面,尾部在最外面。为存档之需,其后的册书则用先前册书余下的绳头连缀在一起,这样首尾相连,以至多个册书,“永元器物簿”就是如此。我们说简册的收卷是